

一个值得重视的《楚辞》注本

——读刘梦鹏《屈子章句》

张崇琛

《楚辞》注本中，刘梦鹏的《屈子章句》一向很少为人所称道。偶有语及者，亦多抑词。如游国恩《楚辞概论》介绍此书说：

清刘梦鹏撰《楚辞章句》（琛按：当为《屈子章句》）七卷。这书就诸本文字的异同，参互考订，亦颇详悉；然不注某字出某本，是他一个缺点。至于篇章次第，窜乱尤多：如《九歌》内《湘君》、《湘夫人》、《大司命》、《少司命》本各自标题，而删除《湘夫人》、《少司命》的篇名，称《湘君》前后篇、《司命》前后篇。又《九章》内把《抽思》、《桔颂》的篇目删去，统名为《哀郢》，且移置它们的先后，都不知何据。又误以《史记》叙事的文章为屈原的话，合《渔父》、《怀沙》为一篇，删去《渔父歌》，而加入“乃作《怀沙》之赋，其辞曰”九字，尤其是任意更张，绝不可从。

游先生的介绍，大体依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（不录），今人言刘书者，多同此说。

己未、庚申之际，余参加教育部举办之“楚辞”师训班，从姜亮夫先生学《楚辞》。适先生处藏有乾隆五十四年藜青堂刊本《屈子章句》一部，乃在先生指导之下，费时三月，潜心研读。读讫，始知向之言《楚辞》者，于刘书长处多未注意，而《屈子章句》实在是一部值得重视的《楚辞》注本。兹特不揣冒昧，略陈一得之见。

首先要指出的是，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及游先生所述刘氏变易屈赋篇章事，均有未尽：如《九歌》内以《东君》与《东皇太一》大旨略同，移为第二；《九章》既出《怀沙》，复入《远游》，并删去各篇之目，而以第一章、第二章等系之，总题曰《哀郢九章》；又以《大招》与屈赋诸篇全不相似，谓非屈原手笔而删去不录。就变乱篇章次第一点而言，刘书洵难称善。

然而，只要细读全书便可发现，篇章次第的“窜乱”，并非刘书的主要特点。刘氏生当考据学甚盛之乾隆时代，其注《楚辞》，不溺于章句，而运用“知人论世”的方法，重在屈子思想的清理、发明，这才是卓然不同于时人的。观乎乾嘉诸子，注书多重训诂考据，而忽视义理阐发，刘氏则无此病。视其注本，每篇皆先有总论，然后分段注释，并合若干段为一节或一章；章又有章旨，节有节义，全书脉络清晰，词气贯通，与大义不明而锱铢作解者迥异。总论及章旨节义亦颇多精闡之见。如辨“依彭咸之遗则”非为投渊之谓曰：

屈子前后称彭咸者六，志行之符，非小谅之效。子政水游云云，亦泥于湛身之说，而非所以为则矣。吾观屈子骤谏不听，任石无益之语，且若有不满于申徒、伍胥者，而于彭咸独惓惓焉，宁无谓耶？且此篇（按指《离骚》）作于楚怀疏黜之日，未应便欲水游，可知遗则自有在也。

又云：

国既无人，又莫知己，悲怀无益，惟有遂初练要，求仁得仁，以从彭咸之处而已。孔云窃比，孟称愿学，志趣依归，各有私淑。彭咸所居，岂赴清冷之谓哉！

王逸以彭咸为殷贤大夫，谏君不听而自投于水，其说无据。梦鹏之说，虽非首创^①，然其言甚辨，颇能启后人之思。俞樾、曹耀湘诸氏之说或受其影响^②。又，《离骚》“欲少留此灵琐兮，日忽忽其将暮”，王逸以“灵琐”为喻楚王之省阁，释日暮为年岁之将尽，亦牵附之甚，后人（如朱熹）虽斥其“非文义”，亦无确解。至梦鹏则谓：

琐，锁闼也。县圃登之则灵，故称灵琐。昆仑三重，最上一重，是维上天，是为太帝之居。原欲上征者，欲上至太帝之居，下文所谓开关，即其处也。县圃近帝关而尚未到者，故不敢少留，恐日暮不及上征者也。

以县圃为屈原幻想中上天必经之地，原欲暂留，又恐日暮，不及上达帝关，说既浅显，又合于文义，故近世注家多有从之者。再如发《东君》篇末“举长矢兮射天狼”之义云：“天狼星在西宫咸池，盖寓言秦也。……呜呼，报仇雪耻，原何日忘之哉！”与戴震报秦之说亦不谋而同^③。他如谓《天问》乃“引而不发，令人自悟，不质言而若疑难”；谓《远游》“与《离骚》末节结意大同”，“神仙度世，皆无聊解脱之语，非真欲学道延年”；本太史公而断《招魂》为屈原所作，谓“假托巫阳之口，备道南州之乐”等，其见解亦皆有胜前人之处。至其论屈子之为人，谓既有悲愤激切之情，又有“深仁笃挚之性”，而最后之投渊乃因不忍见其邦之沦丧，尤能发前人所未发，章学诚推为“能知古人之意”（见章氏《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》），诚非轻许。当然，刘氏以一“名孝廉”而为屈赋作注，又事事皆欲索其旨归，其间儒家说教之言，牵附凿空之处，亦所难免。

是书字词诠释，简明扼要，然又不乏新解。如释《离骚》“不抚壮而弃秽兮”曰：“抚之为言，爱也，护也。壮则犹未零落者，即下‘余饰方壮’之壮。秽，乱芳者。此度，即指不弃秽而言。”谓“不抚壮而弃秽”为不爱抚美壮而扬弃秽恶之义，实较旧解为得，闻一多先生《离骚解诂》辨“壮”字之义即本乎此。再如释《离骚》之“灵修”为善修，谓“伤灵修之数化”“即兰芷不芳，荃蕙化茅之意”，“善修不力，为可伤耳”，亦甚有思致。龚景翰《离骚笺》释“修为修冶，修饰”，“在君为灵修，在臣为好修，其义一耳”，亦似本此。又《哀郢》“皇天不纯命兮”，王逸释“纯”为“纯一”，朱熹释为“不杂而有常”，均颇感扞格。刘氏曰：“纯之为言，笃也。”是“不纯命”即不厚命矣，于义既明且顺。《怀沙》“文质疏内兮，众不知余之异彩”，旧注皆以

“文质”、“疏内”分疏，刘氏则谓：“文，道德之华；质，忠诚之实；疏，豁达；内，木讷。有此四者，屯中发外，彬彬可观，故曰异彩。”亦甚合于《楚辞》之文法^④。他如谓《离骚》“夕归次于穷石兮，朝濯发乎洧盘”，“即下淫游之意”；释“虽信美而无礼兮，来违弃而改求”之“无礼”，为“骄傲淫游，放于礼法”；释“凤皇翼其承旗兮”之“承”为“接”，“言凤皇同翔其上，其翼与车旗相承接也”，都甚切合诗义，而为后人所采用。

刘氏注《天问》，于历史事实的考核，尤有其卓异之处。如“厥萌在初，何所亿焉。璜台十成，谁所极焉”四句，旧注皆不可通。刘氏引《淮南子》谓“璜台十成，极言皇居壮丽之意”，以为此四句当是问舜事，“舜初意本不及此，而卒有天下”。考之上下文义（此章前后皆言舜事），其说甚确。再如“该秉季德，厥父是臧。胡终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”四句，自来《楚辞》注家均不得其解，刘氏乃能据《左传》、《竹书》、《山经》，指出“该”即殷先公之“王亥”，“有扈”为“有易”之讹，“弊于有扈，牧夫牛羊”即王亥败于有易，有易“困辱之，使为牧竖”。其结论之确凿不易，竟令人惊叹。近人王国维通过甲骨卜辞的印证，亦得出了大体相同的结论，然已是在刘氏之后一百多年了。

是书正文之前还冠有《屈子纪略》一篇，为刘氏考证屈子生世之作。其以屈原迁放江南在顷襄十二年，卒于二十一年，均甚有见地（前者与游国恩说只差一年，后者与郭沫若说相同）；然定屈原生年在楚宣王四年，则未免过早。

关于刘氏身世，《清史列传》及《湖北通志》、《蕲水县志》均有记载，略谓梦鹏字云翼^⑤，清蕲水人，乾隆十六年进士，曾官饶阳知县，循声颇著。后以丁艰归，寻卒。所著除《屈子章句》外，尚有《春秋义解》十二卷，大旨推本《公》、《谷》。《屈子章句》的最早刻本即乾隆五十四年藜青堂刊本，其后又有嘉庆五年藜青堂刊本及嘉庆务

本源重刊本(与原刊无大异)。然皆流传未广,今存者亦不多。究其原因,与学人之抑词不无关系。论者于刘书长处不能洞见,而专责其篇章次第之“窜乱”,洵为不公。由今观之,是书要不失为清人注释《楚辞》之重要著作。有清一代,注《楚辞》者颇多,而刘氏《屈子章句》之明晰,与王夫之《楚辞通释》之多微义,蒋骥《山带阁注楚辞》之翔实,戴震《屈原赋注》之精核,可谓各具特色。此意向曾与亮夫师言及,师亦以刘书为佳,且以不能翻印为憾耳。

一九八一年十月一日

注

- ① 对于王说,宋钱杲之已启疑端,其《离骚集传》云:“从彭咸所居者,犹言相从古人于地下也。”
- ② 俞说见《读楚辞》、《楚辞人名考》,《春在堂全书》本《俞楼杂纂》。曹说见《读骚论世》(稿本,北京图书馆藏)。
- ③ 据段玉裁《戴先生年谱》云,戴震《屈原赋注》写于乾隆十七年,刻成于乾隆二十五年冬。刘书虽刊于乾隆五十四年,然据其自序云,乾隆二十五年八月之前已经写成。
- ④ 如《离骚》“览相观于四极兮”之“览、相、观”,《抽思》“好媿佳丽兮”之“好、媿、佳、丽”,《悲回风》“闻省想而不可得”之“闻、省、想”,均与此同类。参余《楚辞文例》。
- ⑤ 《清史稿·艺文志》作刘飞鹏“飞”系“梦”之误。《四库存目》作《楚辞章句》,“楚辞”系“屈子”之误。

